

超越自由與尊嚴



5

斯金納／著
王映橋、栗愛平／譯

港台書室

超越自由與尊嚴

斯金納／著
王映橋、栗愛平／譯

B84
891-2



90086565

人與社會名著譯叢⑤
超越自由與尊嚴

原 書／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作 者／Burrhus F. Skinner

譯 者／王映橋、栗愛平

發行人／王 榮 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傳真號碼／341-0760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0 年 5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 授權契約係經由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代表人：孟森）安排

售價 14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我們選擇「人與社會」做為叢書的名稱，其實已經自我供認了編輯工作的概念與目標。

大體上，我們希望忘掉科門的界限，以「人」為中心，向兩端探望，一端看「個體的人」，一端看「羣體的人」。

在個別的人這邊，不管是把人做為一種生物，還是做為一種精神現象，我們都企圖將它們納入理解人的光譜之中。在羣體的人這邊，不管是人羣的生產行為、政治行為、或其他社會行為，都在我們意欲探知之列。在這樣的編輯概念下，一本在學科分類上分屬於社會生物學、行為科學、哲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乃至於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諸學科的著作，都有可能收入此一叢書。——如果這樣的工作概念能夠免於泛無依歸，當然必須我們緊守「人的研究」的前提，考量呈現其多面性，卻同時要求其「突破性」的成就。

這部《人與社會名著譯叢》和我們前此出版的《比較文化叢書》一樣，一部分譯著成績來自中國大陸（主要是貴州人民出版社），另一部分則來自我們編輯工作同仁的選擇；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整合，能較快將此一主題的世界成績表現出來。對個別翻譯作品的來源，我們會在版權頁上詳細標示出來。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超越自由與尊嚴/斯金納(Burrhus F. Skinner)著;王映橋,

栗愛平譯 --初版-- 臺北市:遠流,1990[民79]

[196]面; 21公分--(人與社會名著譯叢;5)

譯自: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ISBN 957-32-0557-2(平裝)

1.行為科學

501.9

目 錄

第一章	行爲技術	1
第二章	自由	21
第三章	尊嚴	37
第四章	懲罰	51
第五章	懲罰的替代	71
第六章	價值	87
第七章	文化的演進	109
第八章	文化的設計	125
第九章	人是什麼？	159

第 1 章

行為技術

爲了解決今日世界所面臨的種種可怕問題，我們自然會求助於我們最擅長的事物。解決問題需憑藉力量，而我們的力量就是科學技術。爲控制人口爆炸，我們尋求更好的節育措施；面對核屠殺的威脅，我們建立更龐大的威懾力量和反彈道導彈系統；爲根除世界性飢荒，我們探尋新的食源和更佳的種植方式。我們希望，經過改善的衛生與醫療條件能控制疾病，更好的住房與交通條件能根除城市貧民窟的各種問題，而減少或處置廢物的新方法則能制止環境污染。我們能列舉出人類在所有這一切領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且，毫不奇怪，我們理應盡力擴展這些成就。但是，這一切根本不能阻止局勢的不斷惡化，人們痛心疾首地發現，技術本身就在釀成與日俱增的災禍。衛生與醫療條件使人口問題愈加尖銳，核武器的發明使戰爭增添了新的恐怖，對幸福和享樂的肆意追求乃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正如達林頓(C.D. Darlington)所說：「每一種新資源的開發都能增加人類在地球上的力量，但同時也損害了人類子孫後代的美好前景。人類的一切進步都以自身環境遭到破壞爲代價，對於這種破壞，人類既無法補救，也無法預見。」

無論人能否預見此種破壞，他都必須設法對此加以補救，否則一

切都將付之東流。但只有在人認清這一困境的實質之後，他方能做到這一點。單純依靠物理學和生物學是無濟於事的，這是因為唯有另一科學領域才能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除非人們採用避孕方法，否則再好的避孕措施也不能遏制人口增長。新式武器可以摧毀新式防禦，反過來，新式防禦也能抵消新式武器，但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抵禦核毀滅，防止它的唯一辦法是改變那些促使國家之間拔刀相向的條件本身。如果人們對新的農業手段和醫療方式不加利用，它們將毫無裨益。住房問題不僅關係到房屋建築與城市建設，而且關係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要改變擁擠不堪的住房狀況，就必須勸導人們不要蜂聚羣居。除非戒除各種污染環境的行為，否則我們的環境將無止境地惡化下去。

總之，我們需要大刀闊斧地改變人類行為。然而，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無法單靠物理學或生物學的幫助來實現這些改變（而且，我們還面臨別的問題，如教育制度的失敗，年輕一代的不滿與反抗等，而物理技術和生物技術同這些問題顯然毫不相干，因此它們從未被用來解決這些問題）。單單講什麼「科學技術的應用需要對人的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或者「讓科學技術服從於人的精神需要」，「要鼓勵科技人員正視人的問題」，這是遠遠不夠的。這些說法實質上是在暗示，在人類行為與科學技術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也就是說，它們主張我們必須一如既往地行事，繼續依賴於我們的個人經驗，依賴於匯集個人經驗的歷史，或依賴於積澱在民俗智慧和陳規慣例中的經驗。多少世紀以來，這些經驗可謂遍地皆是，俯首可得，但它們的唯一業績只是造就了當今世界的可悲現狀。

我們所需要的是一門行為技術。只要我們能像調整宇宙飛船的飛行軌道那樣精確地調整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只要我們能以在加速高能粒子時所懷有的那種信心來改善工農業，只要我們能像物理學穩步

趨近絕對零點那樣腳踏實地的創造出一個和平世界(儘管這兩種目標或許是永遠不可及的),我們便能夠迅速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不過,我們缺乏一種在力量上和精確性上可與物理和生物技術相媲美的行為技術,對那些堅信人類有可能創造完美行為技術並拒絕對這種可能性持譏笑態度的人來說,這種局面更可能使他們感到驚恐沮喪,而非信心十足。這可以表明,同物理學和生物學對各自領域的了解程度相比,我們對「人類問題的了解」是何等可憐;這同時也表明,面對世界正不可逆轉地走向災難這一現狀,我們是何等的無能為力。

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人類對自身的了解程度可以說跟他對其周圍世界的了解程度一樣;而在今天,人對自身的了解相形之下卻微乎其微。物理學與生物學均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但人類行為學的發展卻根本無法與它們的發展相提並論。古希臘的物理學和生物學現在僅剩下了歷史意義(當今任何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都再不會求助於亞里斯多德),然而,柏拉圖的對話集迄今仍是學生的必讀物,仍為人們所大段引用,好像它們揭示了人類行為的底蘊奧蹟。亞里斯多德絲毫不懂現代物理學和生物學,但蘇格拉底和他的朋友們卻能不太困難地理解今天關於人的問題的大部分討論。就技術而言,我們在控制物理世界與生物世界上已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在政府、教育以及許多經濟領域方面卻並無多大進展(雖然這類技術所要適應的社會環境與古代已大不相同)。

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很難說是因為古希臘人已經掌握了有關人類行為的一切知識。當然,他們對人類行為的了解肯定超過了其對物理世界的了解,但這種了解依然是十分膚淺的。而且,他們思考人類行為的方式一定有著某種致命缺陷,因為,不管古希臘的物理學和生物學如何幼稚,它們終究導致了現代科學,而古希臘的行為理論卻引導

不出任何現代成果。如果說這類理論今天仍與我們同在，這並不表明它們領有某種永恆真諦，這恰好說明它們本來就不具備能結出更好果實的種子。

人類行為研究一直被看作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領域，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由於我們在處理人類行為方面常常束手無策，這種看法便更為根深柢固，但是，現代物理學和生物學業已成功地解決了許多難題，它們的難度並不低於多數行為問題。其間的真正區別是，物理學和生物學所使用的儀器、方法都具有相當的複雜性，而行為科學卻缺少同樣有力的儀器與方法。但這一事實的存在並不能構成對問題的全部解釋，它只是說明了整個複雜問題的一部分。難道將人送上月球比改善我們公立學校的教學狀況要容易？或者比替每個人建立更好的生存空間更容易？或者，它比盡可能為每一個人提供收益豐厚的工作，進而使每個人都能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要簡單得多？這裏的選擇並不取決於哪一項工作更重要，因為沒有人會聲稱登月比這一切要重要得多。登月旅行之所以令人振奮，是因為登月已經成為可能，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只要進行一番認真的努力，就能登上月球。而在解決人類行為所帶來的問題方面，我們卻沒有能與之媲美的令人激動的成就，因為我們遠未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

人們很容易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人類行為一定具有某種無法加以科學分析的東西，因而不可能產生出適用於該領域的有效技術。但是，我們遠遠沒有窮盡相關的可能性。不僅如此，在一定意義上講，科學方法幾乎從未被應用到對人類行為的研究中。我們也曾使用過科學儀器，進行過計算、測量和對比，但當前對人類行為的所有討論都缺乏科學研究的本質。這與我們如何對待行為的原因密切相關（雖然「原因」這

一術語在現代科學文獻中早已不通用，但它對這裏討論的問題卻有其作用)。

人對於原因的最初經驗可能來源於他自身的行為。如果東西移動了，那是因為他移動了它們。如果別的東西移動了，那是因為別人移動了它們。如果觀察不到移動東西者，那是因為他乃是無形無相的。這樣一來，希臘諸神便成了自然現象的原因。神明通常存在於被他們所驅動的事物之外，但他們也可能進入事物內，「附體纏身」。物理學和生物學很早便摒棄了這種解釋，並致力於尋找更為有用的原因。不過，在行為研究領域內，這一決定性步子迄今還沒有邁出。有識之士當然再不會相信鬼怪附身之說(雖然有人偶而會玩弄驅妖術，而且在精神治療學家的著述裏，妖魔之類的字眼兒也曾出現過)，但不少人仍把行為歸結於人的內在因素，例如，把少年犯罪說成是人格障礙所造成的結果。執這種看法的人勢必要堅持把人格與遇到麻煩的人體相區分，否則他們的解釋就會是毫無意義的廢話。他們聲稱人體內有幾種不同的人格，它們各以不同的方式並在不同的時間控制著人體，這樣便把人格與人體清楚區分開來。精神分析家們已判明了三種這樣的人格——自我、超我與本我，據說，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引發了人的行為。

雖然物理學很早便停止了這種把事物人格化的做法，但它在過去的確曾主張，事物都具有諸如意志、衝動、情感、目的和其他內在動因之類的特性。按照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的觀點，亞里斯多德認為，一個自由下落的物體之所以不斷加速，是因為它發現自己越來越接近自己的家園，因而，它變得越來越愉快。以後的權威則認為，拋物體是由動力，有時叫「衝動」所驅動的。雖然所有這些理論已最終被人們所摒棄，也應該摒棄，但是，行為科學仍在求助於類似的內在因素。人們說，帶來好消息的人因為感到興奮，走起路來會格外輕快；或者

由於衝動，他的舉止會變得粗心大意；或者由於純粹的意志力量的作用，他會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行為方式。這些說法都是司空見慣的。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仍可聽到有關目的的不負責任的看法，但可靠的實驗並不能容忍這些論點。可惜，幾乎所有的人都將人類行為歸結於意志、意圖、目標和目的。如果有人詢問一台機器是否具有目的，那麼，這一問題的真正意義在於：如果能，機器就會更相似於人。

當物理學和生物學著手將事物的行為歸結於本質、特性和本性時，它們便開始遠離人格化的「原因」了。例如，對一個中世紀的煉丹師來說，一種物質的某些特性乃是它易變本質的作用的結果，而且，只要依據某種不妨稱之為「個體差異化學」的東西，便可比較不同的物質。牛頓曾抱怨他同時代人的這一做法。他指出：「如果告訴我們說事物的每一種類都具有一種特定的玄妙本性，事物靠這種本性來活動並產生了明顯的效果，這就等於什麼也沒告訴我們。」（牛頓把玄妙的本性當作是「不能成立的假說」的實例，不過，他自己提出的假說有時也免不了這類毛病）長期以來，生物學一直在求助於生物的本性，直到二十世紀，這一科學才徹底摒棄生機論點。但是，行為仍被歸結到人類本性，而且，還存在一種廣泛的「個體差異心理學」，它運用性格、智能、能力這些特徵來對不同的人加以比較和描述。

幾乎所有的人，如政治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語言學家、社會學家、神學家、人類學家、教育家或心理治療學家，只要關心人類的事務，一直都在以科學方法出現之前的方法來談論人類行為。每天的報紙、每期雜誌、每份專業通訊、每本沾上一點行為學邊的書，都可以提供類似的例子。我們被告知，要控制世界人口的數量，我們就應當改變對子女的態度，消除對大家庭的偏好驕

傲以及對性能力的妄自尊大，樹立對後代的責任感，而大家庭遏制了對老年人的關切，我們應減少它的這種作用；要實現和平，我們就必須對付領袖人物的權力慾或偏執妄想；我們還必須記住，戰爭發端於人們的心靈(minds)，人的自身含有自殺傾向，也許是一種死亡本能，它會導致戰爭，而且人的本性就是好戰的；要解決貧困問題，我們就必須喚起人的自尊，鼓勵人的創造精神，並減少其挫折；要減輕年輕一代的不滿，我們就必須提倡一種目的感，減少疏離感或絕望的心情。一旦我們認識到，我們並沒有掌握實現以上任何一條的有效手段時，我們也許會經歷一場信仰危機，會有一種信心失落感。只有回歸到對人的內在能力的信任，危機與失落感才能被矯正。這種傾向居於支配地位，幾乎無人對它表示質疑。然而，在現代物理學或絕大部分的生物學中，根本沒有與之相類似的東西。這一事實也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長期以來未能形成一門行爲科學和行爲技術的原因。

人們通常認為，「行爲主義」對觀念、情感、人格特徵、意志等的反對責難，關係到這些心理要素的所謂構成基礎。二千五百多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有關心靈本質的一些棘手問題，但至今仍無結果。例如，頭腦如何指揮身體運動？卡爾·波普(Karl Popper)到1965年還這樣提出問題：「我們需要的，是理解為什麼非物質的東西，例如目的、意圖、計劃、決定、理論、緊張感和價值，能在物質世界的物質變化中起一定作用。」而且，很自然的，我們還希望知道這些非物質的東西源於何處。正如多茲(Dodds)指出的那樣，希臘人認為，如果一個人舉止笨拙，那是因為有個敵意的神往他的胸中注入了「糊塗激情」；而一位友善的神會給一個勇士多一些力量和勇氣，助他勇敢地戰鬥。亞里斯多德認為，人的思維中有神聖的東西；而埃利亞(Elea)的芝諾(Zeno)則認

爲，理智就是上帝。

今天，我們已不能接受這種思想，取而代之的最常見的選擇則是求助於先期發生的自然事件。一個人的遺傳天賦，作爲人類進化的產物，被說成是部分地解釋了他心靈的某些機制，而他的個人經歷則解釋了其餘部分。例如，由於在進化過程中的(物質的)競爭，使現在的人們具有(非物質的)攻擊情緒，而這種情緒又促使他採用(物質的)敵對行爲。或者，當一個小孩因玩淫穢遊戲而受到(物質的)懲罰時，會使他產生(非物質的)焦慮心情，這種焦慮心情會干擾他成年後的(物質的)性行爲。非物質階段顯然連接著很長的時間過程：人類的攻擊性已經歷了幾百萬年的進化時間，而孩童時期獲得的焦慮情緒會延續到老年時期。

如果一切東西或者都屬於心靈的，或者全屬於物質的，那麼，從一種構成基礎轉變到另一構成基礎這一困難本可以得到避免。這兩種可能性都曾得到過人們的考慮。一些哲學家試圖僅停留在心靈世界的範疇內，並堅持認爲，只有直接經驗才是真實的。實驗心理學的發端，是試圖發現支配心理因素間相互作用的心理規律。當代精神療法的「內在心理」理論告訴我們，一種情感是如何引向另一種情感的(例如，絕望怎樣孕育出攻擊性)，情感又是如何互相影響的，而被心靈排斥的情感又是如何固執地鑽回心靈的。奇怪的是，佛洛伊德接受了這樣的理論，即心理階段的表現實際上也是生理的表現。他相信，生理學家最終能解釋清楚心理裝置的工作機制。許多生理心理學家也以同樣的方法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談論心理狀態、情感等等。他們相信，我們會最終了解它們的生理本質，而且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

心理世界的範圍和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轉變，的確給人們帶來難題，但人們通常忽略它們。這也許是一種不錯的策略，因爲，

當我們對心理主義提出真正重要的挑戰時，我們所提出的乃是性質迥然不同的問題。心理世界出盡風頭，人們根本沒有認識到行為本身就是研究的對象。例如，在精神療法中，一個人幹的和說的，或令人不安的事情，幾乎都被認為是單純的症狀。同在心靈深處舞台所呈現的令人眼花撩亂的戲劇性場面相比，行為本身似乎顯得十分膚淺。語言學和文學批評將人們說的一切，幾乎全都視為是思想或感情的表現。政治學、神學和經濟學將行為看成是素材，從中可推斷出人們的態度、意圖、需要等等。二千五百多年來，人們對精神生活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僅僅到了最近，人們才著手將行為看成是一個主題，而不是一種簡單的副產物來加以研究。

行為乃是特定條件的功能，而這些條件也被忽視了。好奇往往以獲得心理方面的解釋而告終，我們從日常的交談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如果我們問某人：「你為什麼要去看戲？」他回答說：「因為我想去。」我們就很容易將他的回答當成一種解釋。而更中肯的，是應該了解他以前去看戲時，發生了什麼，他看什麼戲，他曾聽說過或看到過什麼，以及過去或眼下環境裏有什麼事促使他去看戲（而不是去幹別的事）。可我們僅將「我喜歡去」看成是關於這一切的總結，而很可能不再去探究其間的具體內容。

職業心理學家往往也在同一問題上卻步不前。很早以前，威廉·詹姆斯曾糾正過關於情感與行動的關係的流行觀點。例如，他認為，並不是因為我們害怕才逃跑，而是因為逃跑才感到害怕。換句話說，我們感到害怕時所感受到的正是我們自己的行為，即按照傳統觀點用來表現恐懼之情的行為，正是這恐懼之情得以解釋的原因。但是，在那些思考過詹姆斯論點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人認識到了他的論點事實

上根本沒有指出任何作為原因的先在事件？同樣，我們也不必認真看待他的「因為」的字眼，因為它對於為什麼我們要逃跑和感到害怕，根本就沒有提供任何解釋。

無論我們將自己看成是在解釋情感，還是在解釋由情感引起的行為，我們都極少注意到先前的環境。精神治療家所獲知的病人早期的生活，幾乎都來自病人自己的回憶。衆所周知，這些回憶往往是不可靠的。而且，精神治療家或許還會認為，真正重要的，並不一定是事實上發生了什麼，而是病人記住了什麼。在精神分析文獻中，每一種感受到的焦慮都至少涉及上百種解釋，而每一種解釋都會提到一種引起焦慮的懲罰性事件。我們甚至偏愛談論那些顯然是無法企及的先期事件。例如，許多人現在對探究發生在人類進化時期的事件頗感興趣，試圖通過它們來解釋人類行為。而且，許多人之所以能極為自信地大談這些先期事件，其原因正好在於我們只能推斷出那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

由於我們無法解釋我們看到的人是如何行為，又為什麼會如此行為，我們就將他的行為歸因於一個我們看不到的人。後者的行為我們也同樣無法解釋，但卻不願就他提出問題。我們之所以採取這種策略，很可能不是因為我們缺乏興趣或能力，而是由於一個根深柢固的信念在作祟，即認為多數人類行為都不具有相關的先期事件。「內在人」(inner man)的功能的確是提供了某種解釋，但這一解釋本身卻不能得到解釋，由此，解釋便中止在內在人這裏。內在人不是過去歷史與現實行為的中介，而是產生行為的中心。它的作用是發端、產生、創造。如此一來，就像在希臘人心目中一樣，它成為了神聖莫測的東西。我們說它是自主的，從行為學來說，那就意味著是能創奇蹟的，是不可

思議的。

自然，這種立論十分脆弱。「自主人」(autonomous man)僅能解釋那些我們無法用別的方法來解釋的事情，它的存在依賴於我們的無知；我們對行為的了解增多，它自然就要失去其地位。科學分析的任務，是要解釋作為一個自然系統的人的行為是如何同人類進化的條件和個人生存的條件相聯繫的。這些事件肯定是有聯繫的，除非確實存在有某種神秘莫測的或創造性的干預。但事實上，假設這種干預是毫無必要的，造就人的遺傳天賦的生存性相倚聯繫①產生的是攻擊性行為傾向，而不是攻擊性感受。對性行為的懲罰改變的是性行為，隨之所產生的任何感受至多不過是副產物而已。我們時代所受的折磨，並不是源於焦慮，而是源於事故、犯罪、戰爭，以及人們常常遇到的那些危險和痛苦的事情。年輕人中途輟學，不去工作，僅與同他們年紀相仿的人相處交往，並不是因為他感情異化，無人理解，而是由於家庭、學校、工廠和其他有缺陷的社會環境所造成。

我們可按照物理學和生物學的途徑，直接探討行為與環境的關係，而不必去理睬臆想的心理中介狀態。物理學的進步並不是因為更直接地觀察下落物的喜悅，生物學也不是因為觀察生命精神的本質而取得進展。而且，我們也不必試圖通過發現什麼是自主人的人格、心理狀態、情感、個性特徵、計劃、目的、意圖或別的特點，來推進一種新的科學的行為分析。

為什麼我們經歷了如此漫長的階段才認識到這一點，這裏有一定的原因。物理學和生物學所研究的對象的活動並不同於人的活動，談論一個下落物的喜悅，或拋物體的衝動自然顯得十分可笑。然而，人的確是像人般的行為，其行為需要解釋的「外在人」(outer man)可能十分